

高校招生均等化政策改革与生源质量提升

刘瑞明 焦豪 石阳 毛宇

【摘要】中国的高等院校招生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明显的“本地偏好”，为解决由此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教育部在2008年出台了一项强力的“均等化”政策，要求“部属高校”将本地招生比例逐步降低至30%以下。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准实验”来观察中国高校中存在的本地偏好及其后果。本文首次利用中国2005-2015年1189所高等院校的面板数据和双重差分方法，分析“均等化”对高校生源质量的政策效应。研究发现：“均等化”使得“部属高校”的招生分数大幅提升，有力地推动了所在高校的生源质量，并且，这种生源质量提升效应在本省和外省均显著存在。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均等化”政策实施后，部属高校调整了招生策略，将更多的招生指标分配给了外地省份，尤其是那些高分省份，从而产生了“双重结构优化效应”。在进行大量的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这意味着，“均等化”政策带来了明显的招生名额优化配置效应。根据本文的发现，中国的高等院校“均等化”是保障未来教育质量提升和教育机会公平的一个重要举措。

【关键词】本地偏好；部属高校；生源质量；均等化；准实验

【作者简介】刘瑞明，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电子信箱：liuruiming@ruc.edu.cn(北京 100872)；焦豪(通讯作者)，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电子信箱：haojiao@bnu.edu.cn(北京 100875)；石阳，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电子信箱：billybilly10@163.com；毛宇，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电子信箱：xidamaoyu@126.com。

【原文出处】《经济研究》(京)，2021.7.178~194

【基金项目】本研究得到教育部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项目(18YJA79005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ZD118)、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873134、71903152)、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18XN1007)和北京高校“双一流”建设资金的资助。

一、引言

中国的高等教育在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长足的进展。从1977年到2019年，^①中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不到1%快速上升到45.7%，高考录取率由4.7%上升到了82%。^②这种跨越式的进步，不仅使得适龄青年的人力资本得到了提升，推动了国家经济发展和生产效率提高(郭庆旺和贾俊雪，2009；毛盛勇和刘颖，2010；黄燕萍等，2013；Bramwell & Wolfe, 2008；Che & Zhang, 2017；Liu, 2015)，而且使得大批寒门子弟获得了通过高等教育改变命运的机会，改善了社会收入差距(岳昌君，2004；邢春冰和李实，2011；余秀兰，2014；才国伟和刘剑雄，2014；杨娟等，2015)。毫无疑问，从总量增长的角度来看，中国

在高等教育领域所取得的进步是举世瞩目的。但是，如果从结构的角度来观察，中国的高等教育在现实中却常常受到诟病(李春玲，2014；杨奇明和林坚，2014)。其中，一个异常突出的问题是，部分优质高等教育呈现出典型的“本地偏好”。

高等教育资源分配中的“本地偏好”，集中表现为两个紧密相关的方面：第一，中国的高等教育资源尤其是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在各个地区之间分布高度不均(刘海峰和李木洲，2012)，造成高考录取率在各个地区之间存在差异。以教育部直属高校(以下简称“部属高校”)的区域分布差异为例，现存的75所部属高校中，东中西部拥有的部属高校数目分别为50所、13所、12所，而在所有省份中，内蒙古、河南、

广西等13个经济欠发达的省份没有部属高校。第二,在现实中,代表中国最高办学水平的部属大学在招生过程中存在明显的“本地偏好”倾向,招致了社会大众对于其招生公平性的严重质疑和不满(杜瑞军,2007)。例如,2006年部属高校属地招生比例中,复旦大学是47%,浙江大学高达55%,而中山大学更是高达75%。^③考虑到高等教育资源在短时间内既定且无法大规模调整的情况下,社会大众将问题的矛头指向了以部属高校为代表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在招生过程中的“本地偏好”(刘海峰和李木洲,2012)。

从事实考察,这种“本地偏好”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第一,中国高考决定了一个考生是否能够接受大学教育。如果能被中国最顶尖的一部分大学录取,对其职业前景具有重要影响。部属高校的高度地方化倾向,人为降低了部分省份的考生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机会,违背了宪法中的受教育权平等的原则(曲相霏,2009)。第二,部属高校的高度地方化有碍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和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刘海峰和李木洲,2014),扭曲人力资本的培养,从而影响经济增长(刘玉铭和张庆华,2006)。第三,部属高校的高度地方化带来的教育不平等将加剧收入不平等,弱化教育促进社会阶层的流动功能,加剧社会两极分化(Barro & Lee, 1996; Gregorio & Lee, 2002; 余秀兰, 2014)。第四,部属高校的高度地方化倾向不利于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并加剧了地区间经济和文化差异(杨俊和李雪松, 2007)。

有鉴于这种“本地偏好”危害的日益加剧,严重影响了教育公平和生源质量。因此,为了缓解和改善部属高校的属地化倾向和招生中的本地偏好,实现教育公平和促进社会和谐,教育部于2008年1月出台了《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08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分省分专业招生计划编制和管理工作的通知》,《通知》中规定,部属高校要按照“生源质量为主,兼顾地区平衡”的原则来确定招生计划,并且明确规定“2008年在属地安排的计划比例不得高于2007年,在属地安排计划比例超过30%的,要逐年逐步调整至30%以内”。自此,开始了部属高校事实上

的“均等化”改革。客观上看,“均等化”改革为检验“招生均等化改革与高校生源质量的提升”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遇。因此,本文以此为契机,研究招生均等化改革是否影响了高校生源质量?探究招生均等化改革影响高校生源质量提升的内在机制。

本文抓住2008年教育部“均等化”政策的“准实验”特征,首次利用中国2005-2015年1189所高等院校的高考招录的大样本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方法分析招生均等化改革对于高校招生质量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均等化”的确使得部属高校的生源质量显著提升,这种提升效应在本省和外省均显著。这一结论在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第二,进一步地研究发现,“均等化”政策之所以能够导致生源质量的提升,主要是这一政策诱发了部属高校招生名额配置的“双重结构优化效应”:一方面,“均等化”改革后,部属高校将更多的名额分配到了外省,降低了本省招生数额,从而实现了本省和外省之间的“结构优化效应”;另一方面,“均等化”改革后,部属高校在外省的招生名额配置中,将更多的招生名额分配给了那些相对高分招生的省份,形成了外省生源之间的“结构优化效应”。因而,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是政策效果发挥的重要途径。本文的研究结论意味着,中国的高等院校“均等化”是未来教育质量提升和实现中国高等教育公平的一个重要举措。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首次验证了教育领域本地偏好的后果,拓展了本地偏好的相关文献认知。已有大量文献(Young, 2000; 郑毓盛和李崇高, 2003; 白重恩等, 2004; 李善同等, 2004; 周黎安, 2004; 刘瑞明, 2012)分析了地方保护对地区经济发展带来的不良影响,或者本地偏好如何影响了资源配置和地区发展(Golden & Min, 2013; Hodler & Raschky, 2014; 张平等, 2012; 范子英和李欣, 2014; 范子英等, 2016; 李书娟和徐现祥, 2016; 曹春方等, 2017; 钱先航和曹廷求, 2017)。但是,却鲜有文献研究教育领域中本地偏好的经济后果,在我们的视野内,仅有刘玉铭和张庆华(2006)通过理论模型推导和

数值模拟,分析了重新分配高考名额对地区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和福利变化。因此,本文首次通过实证检验教育中的本地偏好如何影响了高等教育招生质量,能够有力地拓展已有文献的认知。第二,评估了“均等化”的政策效果,为改革政策的评估和推进提供了重要参考。教育部“均等化”政策出台至今已有十多年,然而,对于这一重要政策的实际效果及其内在作用机制,人们却知之甚少,其效果亟待评价。本文通过科学地评估“均等化”政策的效果,能够有力回答上述问题,为这一政策的进一步推广和完善提供了重要依据。第三,发现了“均等化”改革对于生源质量提升的“结构优化效应”,这不仅丰富了人们对于招生质量提升机制的认知,而且能够为未来的高等教育招生改革和资源配置优化提供重要的政策启示。

本文剩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本文的数据、变量与识别策略;第三部分汇报基础计量结果并进行稳健性检验;第四部分是机制检验;第五部分是结语。

二、数据、变量与识别策略

(一)数据

为了验证“均等化”政策是否对部属高校的招生以及生源质量带来积极的影响,本文采用2005–2015年中国1189所高等院校的面板数据来进行分析。所有的原始数据来自“新浪教育-高考”网,^④该网站根据教育部高考招生录取的权威来源,整理了历年中国各类院校在各省区各个科目的招生人数和录取分数等信息。但是,由于各类院校在2005年之前的大部分年份的招生信息严重缺失,因此,本文采用2005年以来的数据进行分析。由于中国的高等院校在每一个省份的每一个年度都招收文科和理科两种类型,^⑤因此,本文根据这一数据结构,构建了“高校-省份-科目-年份”的面板数据。^⑥

(二)变量

1. 被解释变量。就高等院校的招生质量而言,学界最为公认的一个度量方式是招生分数(Bishop, 1987, 1997; Bai et al., 2013)。鉴于中国的高考是目前中国考试中最为严格和公平的,所以高考分数能

够较好地反映学生的整体素质。而且,高考分数的高低会直接影响学生进入高校之后的学业表现(Bai et al., 2013)。因此,本文拟采用高考分数来度量高校的招生质量。但是,如果简单地以高考分数作为代理变量则存在一定的缺陷。一方面,每年的高考试题难易程度存在差异,从而会直接影响分数的均值和方差;另一方面,由于考生不知道互相之间的报考策略,因而,很容易引发高校招生中的“大小年”现象,^⑦因此,简单地拿录取的平均分或者最高分来衡量考生质量存在着较大的误差。为了得到更为科学的评判指标,本文参考Shi et al.(2020)的做法,采用“录取分数线差比例”作为招生质量的度量。这一指标通过计算“录取分数线差”并利用高校招生的平均分数作为分母实现标准化,能够更准确地度量招生质量,用公式表示即为:

$$RScore_{ijkt} = \frac{MeanScore_{ijkt} - TierMin_{ijkt}}{MeanScore_{ijkt}} \times 100$$

其中, $RScore_{ijkt}$ 代表第 t 年大学 i 在省份 j 科目 k 招生的录取分数线差比例; $MeanScore_{ijkt}$ 是第 t 年大学 i 在省份 j 科目 k 招生的平均录取分数; $TierMin_{ijkt}$ 与学校的等级所对应,代表第 t 年大学 i 在省份 j 科目 k 招生上的最低录取分数线,例如,该校是一类本科,则这一数值对应于这一年该省份一类本科的最低录取分数线。 $RScore_{ijkt}$ 衡量了该校录取的平均分数超过该省最低录取分数的比例,本文将之称为“录取分数线差比例”。

这一变量很好地回避了其他度量方式的潜在弊端,能够更加严谨地度量院校的招生质量。第一,“录取分数线差”是指某一年高等院校当年平均录取分数与其所在省份招生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的差值。一般而言,某一省份某一批次的招生名额在事前已经确定,因而该省份该批次的最低录取分数线随着考试难度的大小而变化,通过“录取分数线差”可以很好地排除掉当年高考题目难易程度的影响。第二,由于考生之间报考的信息不对称和报考策略的不同,往往会引发上一年扎堆报考而下一年又无人敢报的“大小年”现象,这在早年考生“猜分报志愿”的方式下尤其明显,因而,本文通过高校招生的

平均分数进行“标准化”。这种构造可以更为准确地捕捉到考生的生源质量,因此,本文采用各个高校在各个省份不同科目上的“录取分数线差比例”作为被解释变量。

2. 核心解释变量。在本文中,所有的部属高校在2008年以后经历了“均等化”政策,构成了文章的实验组。因而,本文生成了两个变量,第一个为“是否教育部属高校”的虚拟变量(Ministry),如果为部属高校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第二个为“是否2008年均等化改革以后”的虚拟变量(08Dummy),如果为2008年及以后年份,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核心变量“均等化”改革即为上述两个变量的交互项(Ministry08),对于2008年之后的部属高校,该变量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3. 控制变量。由于高校录取分数会受到许多其他方面的影响,因此,本文还控制了可能的变量。(1)高校在某一个省份某一个科目上的招生人数直接影响其录取分数,因此,本文控制了高校在该省份该科目所对应的招生名额(stunum)。(2)现实中,一个学校的最高招生分数往往具有偶然性,因而,这可能会导致招生质量被高估,为此,本文用该学校在该省份该科目上招录的最高分数比例线差来控制此类情形带来的可能影响(hrscore)。(3)在中国,“985工程”作为影响中国高等教育最为重要的一项计划,直接影响着高校的办学质量,能够入选“985”高校的,往往被外界认为是进入国家重点扶持计划的信号,因而有可

能引发更多的优质学生报考。尽管在本文的样本区间内,绝大部分的“985”高校名单已经确定,但是,依然有一部分高校入选了“985工程”平台,^⑧因而,为了排除由此而引发的生源质量提升效应,本文还控制了是否入选“985”平台的虚拟变量(d985plus)。(4)录取学校的办学层次也是中国高校运行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标准。在中国,各个学校之间具有鲜明的等级,例如,在高考本科招生的过程中,第1批本科招生、第2批本科招生和第3批本科招生具有鲜明的等级性。一般而言,只有在保证了第1批本科招生权的学校招录完毕后,第2批本科招生才开始启动,第2批本科招生结束后,第3批本科招生才开始启动。因此,本文还控制了高校的招生批次(dgrade1、dgrade2、dgrade3)。(5)在中国的高考划分体系中,考生可以选择文科、理科的科目进行考试,因而,为了区分科目,本文形成了文科、理科的虚拟变量,予以控制不同科目的异质性(dmajor1、dmajor2)。表1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三)识别策略

从本文的样本来看,截至2015年,在1189所高等院校中,有75家高校属于“部属高校”,这75家高校就构成了本文研究中的“实验组”,而其他高校自然就成为了“对照组”。因此,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方法(Difference in Differences)进行识别,通过构造以下计量模型来检验“均等化”改革对高校招生质量的影响:

表1 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rscore	358694	7.850	7.091	0	120.714
Ministry08	382473	0.074	0.261	0	1
stunum	382473	59.014	225.738	1	8088
hrscore	358694	12.450	9.001	0	121.428
d985plus	382473	0.084	0.278	0	1
dgrade1	382473	0.244	0.429	0	1
dgrade2	382473	0.534	0.499	0	1
dgrade3	382473	0.222	0.416	0	1
dmajor1	382473	0.557	0.497	0	1
dmajor2	382473	0.443	0.497	0	1

注:所有变量保留小数点后三位。

$$Y_{ijk} = \alpha + \beta \cdot \text{Ministry08}_{ijk} + X_{ijk} \delta + \gamma_i + \mu_i + \delta_{\text{prov}} \times \gamma_i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 Y_{ijk} 为被解释变量, 下标 i, j, k 和 t 分别表示第 i 学校第 j 个省份的科目 k 和第 t 年, γ_i 代表时间固定效应, 用以捕捉对于所有高校影响相同的年度效应; μ_i 代表学校个体固定效应, 用来捕捉高校不随时间变化的特征。Ministry08 为核心解释变量“部属高校的均等化改革”, X 为其他控制变量。由于各个省份教育会出台一些教育政策, 对高考招生制度改革, 且每个省份每个年份均不尽相同, 而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各省高校的发展及其招生质量。例如, 在本文的样本区间内, 还经历了“3+1, 即语数英+政/史/地/物/化/生”改革、“3+文科综合/理科综合+自选模块”“新课改”“自主命题”“知分填志愿”“平行志愿”等一系列重要的高考改革, 这些高考改革也直接影响到高校的招生质量。为了控制省份随时间变化的特征, 在回归中加入了省份-时间联合固定效应 $\delta_{\text{prov}} \times$

γ_i , 从而识别出更为准确的计量结果。在上述模型中, 着重关心 β 的系数, 其代表了教育部“均等化”招生改革对于生源质量的净影响。

三、计量结果与稳健性检验

(一) 基础回归结果

本文首先检验“均等化”对部属高校招生质量的影响, 基础结果见表2。在表2中, 分别列示了6个回归结果。

其中, 第(1)列是没有加入其他控制变量的情形, 结果表明, 在控制了时间固定效应、学校固定效应以及省份-年份联合固定效应后, 部属高校“均等化”政策的回归系数为2.477, 相较于样本期内的平均线差比例, 提高了约31.554%。根据前文 R_{score} 的定义式, 如果以样本期内的平均招生分数线来计算, 相当于高校平均分数线差提高了约12.583分。上述分析说明部属高校“均等化”政策对录取分数线差比例、

表2 “均等化”改革的分数提升效应

被解释变量	录取分数线差比例					
样本范围	全样本	全样本	理科样本	文科样本	本省样本	外省样本
解释变量	(1)	(2)	(3)	(4)	(5)	(6)
Ministry08	2.477*** (0.148)	0.874*** (0.0715)	1.080*** (0.0924)	0.687*** (0.0680)	0.455** (0.181)	0.848*** (0.0679)
stunum		-0.00304*** (0.000107)	-0.00269*** (0.000104)	-0.00418*** (0.000169)	-0.000835*** (0.000812)	-0.0157 (0.00152)
hrscore		0.650*** (0.00468)	0.642*** (0.00513)	0.684*** (0.00458)	0.495*** (0.0147)	0.686*** (0.00453)
d985plus		0.655*** (0.102)	0.817*** (0.124)	0.320*** (0.0943)	0.731*** (0.264)	0.592*** (0.101)
dgrade2		1.640*** (0.0761)	1.771*** (0.0960)	1.296*** (0.0628)	1.707*** (0.139)	1.351*** (0.0777)
dgrade3		3.439*** (0.121)	4.115*** (0.147)	2.211*** (0.103)	3.890*** (0.324)	3.216*** (0.121)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学校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年份联合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358687	358687	200438	158249	21420	337267
R ²	0.483	0.889	0.892	0.897	0.885	0.904
F	280.253	4799.523	4045.116	4915.321	425.568	6236.618

注: (1) 括号中是根据学校个体聚类的稳健标准误; (2)*、**、***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平均录取分数线有显著的提升效应,这表明改革有助于提升部属高校生源质量。

但是,“均等化”政策的实施情况也可能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因素与线差比例相关从而造成估计的误差。因此,进一步地,在第(2)列中将招生人数、最高分数线差比例、是否“985”高校、招生批次虚拟变量等均纳入回归。部属高校均等化改革政策系数下降至0.874,这说明招生人数、最高分数线差比例、是否“985”高校、招生批次等对于招生分数线差比例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在排除了控制变量对于招生质量的影响后,均等化改革依然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一政策使得线差比例提高了0.874,相当于平均录取分数线差提高4.439分。

4.439分虽然在数值上看起来并不算大,但是在中国的背景下,每一分背后对应的考生人数都可谓“千军万马”,特别是在河南、山东这样的人口大省。据河南省招生办公室公布的《2015年河南省普通高招分数段统计表》(理科)显示,当年理科一本录取线下一分的考生达到1077人,而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的《2015山东高考理科成绩一分一段表》显示,理科一本录取线下一分的考生人数也达1158人,甚至于坊间有俗语“一分一操场”戏称这一现象。而“均等化”改革对于招生分数的提升平均达到4.439分,也就是说,部属高校相比改革之前在全国各省份招生生源名次平均向前移动数千位次,由此不难推断,平均而言部属高校的生源质量较改革之前有着大幅提升。

考虑到中国高考是分文理科进行的,改革对不同学科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故而本文在第(3)列和第(4)列分别对理科子样本和文科子样本进行回归。结果显示,无论是对于理科招生,还是对于文科招生,“均等化”改革均提升了录取分数线差比例,其中理科线差比例上升1.080,平均录取分数提高5.486分左右,而文科线差比例提高0.687,平均录取分数提升3.489分左右。

部属高校“均等化”改革的核心要义是“降低本省招生比例,扩大外省招生比例”,因此有必要分别对于本省子样本和外省子样本进行回归,探究改革

在属地和非属地之间效果是否存在异质性。本文在第(5)列和第(6)列分别对本省和外省样本进行回归发现,“均等化”改革后,本省和外省的招生分数线差比例分别上升了0.455和0.848,相当于平均录取分数分别提升了2.311分和4.307分。无论是对于本省的招生来说,还是对于外省的招生来说,改革都提升了录取分数线差比例。

总体而言,上述结果说明,“均等化”改革的确有利于部属高校招生质量的提升,且对比(3)列、(4)列系数发现,理科提升幅度大于文科,(5)列、(6)列回归系数对比则表明外省提高幅度大于本省。

(二)稳健性检验

尽管上述基础回归的结论非常明显,但是,这一结果依然可能会受到多方面的质疑。为了进一步提升本文结论的可靠性,本文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

1. 平行趋势检验

采用双重差分方法进行分析的一个重要假设是,如果不存在“均等化”改革的冲击,实验组和对照组之间的发展趋势应该是一致的,在事前不存在系统性的差异。在本文的样本中,容易受到质疑的一点是,部属高校因为各种资源的集中以及较高质量的教育水平,使得其在进行“均等化”政策之前就和非部属高校在分数提升效应的趋势上有所差异。如果存在这种差异,则必然会对本文的结论产生影响。

为此,本文根据经典文献(Ferrara et al., 2012)的做法,采用事件研究法进行了平行趋势检验。由于本文的样本区间为2005–2015年,而“均等化”改革发生于2008年,因此,在平行趋势分析中,本文生成了部属高校和每一个年份虚拟变量的交互项,选定改革前一年2007年为基准组,2005年和2006年为事前3年和事前2年(Pre_3和Pre_2),2008年为改革当年(current),2009–2015年的各年分别为事后1–7年(Post_1至Post_7),这样,通过每一年的虚拟变量系数来观察事前平行趋势是否被满足。图1呈现了全样本回归中“录取分数线差比例”的平行趋势检验,观察图形不难发现:第一,部属高校与非部属高校在2008年之前的“录取分数线差比例”基本平行,改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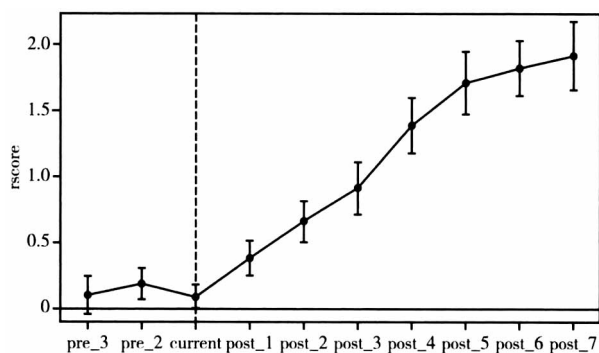


图1 全样本录取分数线差比例的平行趋势检验

之前,并不存在部属高校和省属高校在“录取分数线差比例”上的系统性趋势性差异;第二,部属高校在2008年实行“均等化”改革之后,“录取分数线差比例”这一指标显著异于零,且随着时间推移,呈现出越来越显著的趋势。这说明,“均等化”改革的确使得本地偏好逐渐得到遏制,招生质量开始不断提升。

为了进一步验证,本文还分理科样本、文科样本、本省样本、外省样本,做了平行趋势检验,结果均发现部属高校和省属高校在事前不存在系统性趋势差异,而事后则呈现出显著的递增效果。限于篇幅,此处不再罗列。

2. 替换被解释变量

在基础回归中,选择录取分数线差比例作为被解释变量,这一变量可以很好地捕捉到分数提升效

应,并将各个年份的难度、“大小年”等因素进行标准化处理。理论上来说,录取分数线差比例可以更好地反映学生整体的分数提升效应,但是,平均录取分数也是人们常用的生源质量度量指标,本文的结果是否依赖于被解释变量的选择呢?

为此,本文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各个高校的平均录取分数,以验证“均等化”政策对高校生源质量的提升效应,其回归结果见表3。在表3中,依据基准回归结果的形式进行了回归和呈现,观察表3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均等化”政策对平均录取分数产生了显著的正效应,这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的结论。

3. 排除北京市、上海市的样本

北京市和上海市作为中国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在中国教育资源布局中具有极为特殊的地位,教育部所属的75所高校中,北京市有25所,上海市有8所。本文的结果是否会受到这两个特殊区域教育资源分布的影响呢?为了能更好地识别出“均等化”政策对存在招生本地偏好地区的部属高校生源质量的影响,本文将北京市和上海市排除在样本之外进行计量回归,回归结果见下页表4。观察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在将北京市和上海市的部属高校样本排除之后,“均等化”政策依然对部属高校的整体生源质量有所提升。此外,本文还分别单独排除北京市、单独排除上海市进行回归,结论依然不变,这进一步强化

表3 替换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	平均录取分数					
	全样本	全样本	理科样本	文科样本	本省样本	外省样本
解释变量	(1)	(2)	(3)	(4)	(5)	(6)
Ministry08	15.689*** (0.729)	14.048*** (0.913)	16.431*** (1.041)	10.495*** (0.846)	10.331*** (1.330)	14.061*** (0.915)
控制变量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学校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年份联合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382466	358687	200438	158249	21420	337267
R ²	0.873	0.893	0.941	0.944	0.929	0.894
F	462.569	593.352	713.511	699.699	499.786	495.737

注:表中各列控制变量同表2。下表同。

表 4

去除北京市、上海市高校样本的检验

被解释变量	录取分数线差增幅比例					
样本范围	全样本	全样本	理科样本	文科样本	本省样本	外省样本
解释变量	(1)	(2)	(3)	(4)	(5)	(6)
Ministry08	2.477*** (0.148)	0.874*** (0.0715)	1.080*** (0.0924)	0.687*** (0.0680)	0.455** (0.181)	0.848*** (0.0679)
控制变量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学校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年份联合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358687	358687	200438	158249	21420	337267
R ²	0.483	0.889	0.892	0.897	0.885	0.904
F	280.253	4799.523	4045.116	4915.321	425.568	6236.618

本文的结论。

4. 排除没有教育部直属院校的省份

部属高校在招生过程中的本地偏好之所以引起社会大众的强烈不满,一方面与考生在接受优质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有关;另一方面则与部属高校的区域分布的不均衡有关。山西、内蒙古、河南、河北、江西、海南、青海、宁夏、西藏、新疆、广西、云南、贵州等13个省份都没有教育部直属高校。因此,在这些省份不存在部属高校属地的本地偏好,这可能会对计量结果产生影响。为了更进一步地检验本文结论的稳健性,本文将这13个省份的高校样本剔除掉,回归结果见表5。观察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在去除这13个省份的高校样本之后,回归结果与基础回归结果

无明显差异。

5. 以一类本科高校为样本的检验

在中国,高校的质量存在着严格的等级划分,具体表现在其招生批次上,各个学校依据其招生质量被区分为1本批次高校、2本批次高校、3本批次高校和专科批次高校,因为部属高校往往是那些最好的高校,因此,如果将第2批本科和第3批本科学校作为参照组,可能会影响本文评估结果的准确性。为了使对照组的选择更为合理,本文将样本缩小至第1批本科高校再进一步回归,回归结果罗列在表6中。结果显示,“均等化”政策对部属高校生源质量的提升效应依然稳健。

上述结果表明,在进行了多种稳健性检验后,教

表 5

排除没有教育部直属院校的省份样本的检验

被解释变量	录取分数线差增幅比例					
样本范围	全样本	全样本	理科样本	文科样本	本省样本	外省样本
解释变量	(1)	(2)	(3)	(4)	(5)	(6)
Ministry08	1.901*** (0.113)	0.845*** (0.0587)	1.017*** (0.0714)	0.669*** (0.0619)	0.414** (0.179)	0.859*** (0.0574)
控制变量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学校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年份联合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204144	204144	113851	90280	14488	189654
R ²	0.454	0.882	0.882	0.892	0.892	0.897
F	282.206	4152.910	3681.725	3205.218	363.544	5342.716

表6

以一类本科高校为样本的检验

被解释变量	录取分数线差增幅比例					
样本范围	全样本	全样本	理科样本	文科样本	本省样本	外省样本
解释变量	(1)	(2)	(3)	(4)	(5)	(6)
Ministry08	1.520*** (0.177)	0.661*** (0.0813)	0.837*** (0.114)	0.702*** (0.0839)	0.632*** (0.153)	0.633*** (0.0794)
控制变量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学校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年份联合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92878	92878	54801	38040	5345	87514
R ²	0.770	0.939	0.946	0.944	0.938	0.944
F	73.598	503.859	284.701	232.437	131.586	573.895

注:表中各列控制变量同表2,但因为此时回归中只有第1批本科高校,未包含 dgrade2 和 dgrade3。

教育部于2008年明确要求部属高校本地招生比例下降的“均等化”政策,显著地提升了部属高校的“录取分数线差比例”。这说明对于招生名额分配中的“本地偏好”的遏制,的确有助于高校招生质量的提升。

四、机制检验

根据前述的分析,“均等化”改革带来了部属高校招生质量的显著提升,而且,这种质量提升效应不仅仅体现在全样本中,在区分理科、文科、本省和外省的子样本后,均发现了这种质量提升效应。那么,这种分数提升效应究竟是通过何种方式引发的呢?其内在机制是什么?从逻辑上看,不同的机制意味着截然不同的政策启示,因而,招生质量提升机制的探究,不仅对于理解“均等化”的改革效果非常必要,而且对于未来的政策设计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理论上讲,部属高校的招生质量提升可能来自两种方式:第一种是“总量下调效应”,通过招生人数总数的下调来实现招生分数提升。也即,如果一个学校的招生名额总量变少了,那么,自然会导致更激烈的竞争,从而抬升分数。“总量下调”这种做法固然对于单个高校来说可能会提升分数,但是在当下的中国并不是一种合意的做法:一方面,招生名额的减少使得一部分本该上学的学生无学可上,这在当前中国高等教育普及率依然有待提升的情况下难以接受;另一方面,总量下调只是简单地缩小了招生名额,此时的分数提升并没有改善招生“配置效率”,因

而,这种方式并不值得倡导。第二种是“结构优化效应”,也即在招生总数不变的情况下,通过招生名额在各个区域之间的优化配置,来实现招生质量的提升。这种方式直接改善了招生名额的“配置效率”,因而,此类方式能够带来匹配效率改善和招生质量提升,是值得倡导的。现实中,究竟是哪一种机制在起作用呢?

毫无疑问,高校的招生名额分配会直接影响招生分数,这也是为什么“本地偏好”广受批评以及“均等化”政策出台的原因。事实上,在“均等化”政策出台和执行的过程中,教育部始终强调对于这种“错配”的纠正和改善。因而,一个可能的机制是,“均等化”改革纠正了原有招生名额分配中的本地偏好,从而导致了招生质量的显著上升。在此,就从招生人数的角度来分析“均等化”改革如何影响了招生名额分配,以及高校是如何在不同的省份间进行结构优化的。

为此,首先通过T检验对教育部直属高校在2008年改革前后的招生名额进行分析,其结果罗列在表7中。在下页表7的第(1)行中可以观察到,在“均等化”改革之前,部属高校平均招生规模约为2845名,在“均等化”改革之后,部属高校平均招生规模约为2981名,相比于改革前,改革后部属高校的招生规模扩大了136名,但没有显著的统计性差异。这意味着,部属高校的招生质量提升效应并不是因为

表7

部属高校在“均等化”政策前后的招生人数变化^①

样本	样本量	各校年度招生人数均值		T检验	
		05—07年 (政策前)	08—15年 (政策后)	差异 (政策前-政策后)	t值
(1)教育部属高校	788	2845.671	2981.465	-135.794	-0.951
(2)教育部属高校,本省招生	702	1064.433	838.626	225.807	3.081
(3)教育部属高校,外省招生	788	1958.644	2216.145	-257.501	-2.752
(4)教育部属高校,高分外省招生	788	668.954	1605.066	-936.112	-12.693
(5)教育部属高校,低分外省招生	783	1289.690	616.467	673.222	12.618
(6)教育部属高校,一本录取率低省份的外省招生	788	1087.167	1337.330	-250.163	-4.344
(7)教育部属高校,一本录取率高省份的外省招生	788	871.477	878.815	-7.338	-0.177

注:由于部分年份的高校样本有缺失,因此,样本量稍有差异。

减少了招生名额而引发的,部属高校的招生质量提升并不是来自“总量下调效应”。

进一步,本文考察“均等化”改革引发的招生名额结构优化效应。在表7中的第(2)行和第(3)行,平均而言,“均等化”改革后,部属高校本省的招生规模下降了约225名,外省的招生规模上升了约257名。也即,部属高校在“均等化”改革前后,对本省和外省的招生名额进行了优化配置。这首先解释了基础回归中,本省分数为什么会上升的问题,在本省招生规模缩减的情况下,本省竞争激烈程度上升,从而导致招生分数提升。

然而,为什么外省招生规模上升了,但外省的招生分数也上升了呢?为了解开这一谜题,本文进一步根据“均等化”改革前(即2005—2007年)的高考分数,将高于录取分数线差比例均值的省份界定为“高分招考省份”,将低于录取分数线差比例均值的省份界定为“低分招考省份”。表7中第(4)行和第(5)行显示,均等化改革后,部属高校在省外“高分招生省份”的招生人数平均上升了约936名,在省外“低分招生省份”的招生人数平均下降了约673名,也即将省外“低分招生省份”的招生名额调剂给了省外“高分招生省份”。

此外,人们还关心的一个问题是,这种名额调剂是否促进了“公平”?由于优质高校在不同省份之间的分布不均衡,不同省份的考生进入优质高校的概率全然不同。因此,本文根据“均等化”改革前(即2005—2007年)的高考分数,计算了每一个省份的“一

本录取率”,用来度量优质高校录取的难度,经过测算,在样本中,江苏、湖南、河南、江西、西藏、广西、河北、四川、甘肃、安徽、贵州、宁夏、山东、内蒙古、福建、广东等16个省份的一本录取率低于均值,本文将这16个省份界定为“一本录取率低的省份”。表7中第(6)行和第(7)行显示,均等化改革后,部属高校在“一本录取率低的省份”的外省招生人数平均上升了约250名,在“一本录取率高的省份”的外省招生人数平均上升了约7名。这说明,在给省外的名额中,绝大部分都分配给了那些优质教育更加紧缺的省份,增加了这些省份的一本录取率。

至此,我们可以发现,这种招生质量提升效应主要来自前述的招生名额“双重结构优化效应”。

为了进一步验证上述的逻辑是否成立,本文将“均等化”改革“是否本省”以及二者的交互项同时放入回归当中进行检验,回归结果呈现在表8中。通过观察表8不难发现,首先,相较于省属高校,部属高校在“均等化”改革后,招生的相对规模有微弱下降。其次,部属高校本身确实存在着严重的“本地偏好”,相较于外省,本省的招生名额与外省招生名额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最后,交互项表明,在进行了“均等化”改革后,本省的招生名额显著下降。这种效果不仅在总样本中存在,在理科子样本和文科子样本中也存在,这充分验证了“均等化”改革对于本省和外省之间招生名额配置的“结构优化效应”。

那么,在外省的名额分配中,部属高校是否会将那些“低分招生省份”的名额配给到“高分招生省

表 8

“均等化”改革对于招生人数的影响:本省和外省的差异

被解释变量	招生人数		
样本范围	全样本	理科样本	文科样本
解释变量	(1)	(2)	(3)
Ministry08	-6.514**(2.613)	-10.283*** (3.516)	4.793*** (1.670)
samepro	615.354*** (13.123)	838.242*** (19.777)	398.653*** (10.863)
Ministry08×samepro	-254.078*** (40.983)	-228.829*** (67.589)	-287.807*** (17.44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学校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省份—年份联合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N	358687	200438	158249
R ²	0.457	0.529	0.509
F	370.181	286.746	222.373

注:表中各列控制变量同表2,但未包含招生人数本身,下表同。

份”去,从而实现结构优化呢?为此,本文根据“均等化”改革之前年份的数据(2005—2007年),按10%、30%、50%、70%、90%的分位数分界点,将高考平均录取分数线差比例分为6个区间,其中,10%以下的为录取分数线差比例最低的高校。本文以此为基准组,将10%—30%区间、30%—50%区间、50%—70%区间、70%—90%区间和90%以上区间分别界定为第2、3、4、5、6档(2.highpropc—6.highpropc),档数越高意味着在改革之前录取分数线差比例越高。本文将这些虚拟变量和“均等化”改革的交互项放入回归,来观察“均等化”后的招生名额分配,具体结果在下页表9中。

观察表9发现,所有的交互项均显著,也即相比于分数线差最低一档的录取省份,部属高校在均等化改革以后,将更多的招生名额配置到了分数线差比例较高的招生分数录取省份,实现了结构优化配置。

进一步地,本文还关心“均等化”改革的公平效应,也就是说,“均等化”以后,是否使得那些优质教育资源缺乏省份分配到了更多的名额?为此,本文根据“均等化”改革前(即2005—2007年)的高考分数,计算了每一个省份的“一本录取率”,用来度量优质高校录取的难度。本文将一本录取率低于均值的16

个省份界定为低一本录取率省份(lowlevel1 pro),然后,将其与“均等化”改革的交互项引入到回归中,具体结果见下页表10。

表10的结果显示,“均等化”改革的总效应为正,也即给外省增加了更多的名额。并且,“均等化”改革会通过“结构调整”带来“公平效应”,在那些一本录取率高的地区,部属高校降低了招生名额。但是,在那些一本录取率低的地区,部属高校增加了招生名额,这有助于缓解那些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缺乏省份的竞争性,降低已有的不公平程度。

上述结果表明,部属高校的“均等化”改革政策之所以能够提升招生质量,并非来自“总量下降效应”,而是通过“双重结构优化效应”来实现的:一方面,“均等化”改革倒逼部属高校将本省的招生名额压缩,而将招生名额让渡给考分更高的外省生源,带来了招生质量提升效应;另一方面,在外省招生名额的分配过程中,也尽量避免将名额分配给那些招生质量差的外省,而是将更多的名额配给到了招生质量好的外省省份和那些一本录取率低的外省省份,实现了资源配置优化和公平效应。而这两种方式,都使得部属高校招生中的本地偏好得以打破,在促进全国考生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机会公平的同时,也对生源质量产生了积极作用。

表9 “均等化”改革后的结构优化效应:外省高分省份招生人数增加

被解释变量	招生人数		
样本范围	外省样本	外省理科样本	外省文科样本
解释变量	(1)	(2)	(3)
2.highprope	0.931*** (0.318)	1.878*** (0.437)	0.828*** (0.189)
3.highprope	0.585 (0.368)	2.649*** (0.546)	0.784*** (0.226)
4.highprope	0.503 (0.451)	2.744*** (0.619)	0.714** (0.293)
5.highprope	-0.136 (0.534)	2.340*** (0.742)	0.327 (0.311)
6.highprope	-2.574*** (0.685)	-0.322 (0.910)	-1.045*** (0.349)
Ministry08	-20.056*** (5.528)	-28.084*** (3.060)	-5.149*** (1.047)
2.highprope×Ministry08	17.286*** (5.555)	29.947*** (2.719)	3.738*** (0.996)
3.highprope×Ministry08	23.044*** (6.171)	38.714*** (4.361)	4.689*** (1.129)
4.highprope×Ministry08	21.948*** (5.971)	34.471*** (3.943)	4.689*** (1.084)
5.highprope×Ministry08	19.997*** (5.859)	29.542*** (3.685)	3.585*** (1.053)
6.highprope×Ministry08	15.288*** (5.812)	22.030*** (3.382)	2.235** (1.07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学校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省份—年份联合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N	337267	189176	148081
R ²	0.309	0.420	0.383
F	45.152	36.755	36.176

表10 “均等化”改革的公平效应:外省一本录取率低的省份招生人数增加

被解释变量	招生人数		
样本范围	外省样本	外省理科样本	外省文科样本
解释变量	(1)	(2)	(3)
Ministry08	-9.766*** (1.399)	-11.521*** (1.988)	-2.739*** (0.534)
lowlevel1pro×Ministry08	12.708*** (1.819)	18.825*** (2.929)	1.332** (0.52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学校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省份—年份联合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N	337267	189176	148081
R ²	0.309	0.419	0.381
F	97.592	52.807	70.163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鉴于中国的高等院校招生中“本地偏好”所带来的危害日益加深,教育部于2008年采取了一项强有力的“均等化”政策,出台文件要求“部属高校”将本地招生比例逐步降低至30%以下。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准实验”来观察中国高校中存在的本地

偏好及其后果。本文利用中国2005–2015年1189所高等院校的面板数据和双重差分方法,分析了“均等化”政策对于高校招生质量的提升效应。研究发现:“均等化”使得部属高校的招生分数线差比例大幅提升,有力地推动了所在高校的生源质量。在进行大量的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地

机制检验表明,这种招生质量提升效应并非来自“总量下降效应”,而是来自“结构优化效应”,这一政策具有直观而显著的资源配置改善含义。

本文的研究意味着,本地偏好地遏制的确能够提升高校招生质量,因而,进一步遏制地方招生中的本地偏好,是未来中国高校招生质量提升的一条重要途径。这对于当前中国高考招生制度和教育资源配置的改革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

第一,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贯彻落实“均等化”政策对于教育公平和教育质量至关重要。尽管教育部的“均等化”改革已经启动了十多年,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但是这一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依然受到了一些质疑。从数据来看,尽管大部分部属高校执行了教育部的规定,但是仍然有许多部属高校招生比例高于教育部规定的30%,例如,即使是在政策颁布7年后的2015年,华南理工大学、浙江大学和中山大学当年的属地招生比例仍然分别高达55.1%、53%和52.1%,部分部属高校甚至出现了属地招生比例不降反升的现象。因此,如果要解决本地偏好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强化政策执行,贯彻落实“均等化”政策。

第二,应当进一步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并根据人口分布特征来设计高考招生名额分配,促进教育公平和教育质量。尽管2008年的“均等化”改革相比之前是一种巨大的进步,但是,从全国人口和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分布的情况来看,30%的属地招生比例的合理性同样受到了各界质疑。对于全国31个省区来讲,部属高校基本都是代表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985”院校、“211”院校和“双一流”院校,而这些高校又基本集中在北京、上海、江苏、陕西、湖北、四川、湖南、广东等少数的一些省份,山西、内蒙古、河南、河北、江西、湖南、海南、青海、宁夏、西藏、新疆、广西、云南、贵州等13个省区都没有教育部的直属高校,对于那些既是生源大省又没有部属高校的部分省份来说,30%的比例距离招生公平还相差甚远。这意味着:一方面,需要在优质高等教育的地域布局方面有所突破;另一方面,需要进一步优化招生名额的配置,构建与各个省份人口结构匹配的招生名额分配机制。

第三,在部属高校“均等化”之外,对于省属高校的“均等化”也迫在眉睫。事实上,除了部属高校的本地偏好,以承担地方高等教育事业为主的省属“公立高校”也存在着极为严重的本地偏好。这种本地偏好导致高校生源结构严重不均衡,学生来源单一,对于教育质量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尽管按教育部要求,省属地方高校省外招生比例不得低于30%,但是,现实中这个要求很难被执行。例如,在陕西省属一本高校中,西安外国语大学2013年的省内招生比例为77%,西安理工大学为78%,其外省招生比例严重不足。而本文的研究表明,由“均等化”所引发的“双重结构优化效应”可能会使得招生质量迅速提升,是对于省属高校的一种良性倒逼机制。

第四,需要为高校“均等化”配套相关政策,保障“均等化”的顺利实现。已有研究发现,高校招生中之所以出现严重的本地偏好,部分根源于高校发展过程中对于地方政府在土地、资金、办学空间等方面的高度依赖,因而,如果不能从这些方面对于高等院校予以支持,则一定会影响到“均等化”政策的执行及其效果。因此,从实际出发,破除招生中的本地偏好,还需要强化中央财政的投入,降低高校对于地方政府的依赖度,从而真正推动中国的教育质量提升。

当前,中国正处在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期,如何构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为中国未来的创新驱动和产业升级提供坚实后盾,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本文的研究指出,高质量高等教育资源供应的公平性在这一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不同于通常的认知,本文发现“公平”和“效率”并不矛盾,高等教育招生中的“机会公平”可能会诱发高校在招生名额配置中的“双重结构优化效应”,从而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双重目标。因而,一方面,需要“保障教育公平”,从而在实现“机会公平”的基础上为国家的安定和谐和长远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另一方面,需要“优化资源配置”,从而在实现生源质量提升的基础上为未来的创新驱动和产业升级提供人才保障。归根结底,中国要想在今后进一步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建设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大学,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保障高校招生中的机会公平。

本文曾在“第18届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汇报,作者感谢与会学者的建议,感谢江艇、陆方文等学者的帮助和杨冰岩同学出色的助研工作;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当然,作者文责自负。

注释:

①之所以从1977年算起,是因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高考发生在1977年。

②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是指“高等教育在学人数/(18—22岁人口数)”;高考录取率是指“当年大学录取新生数/当年参加高考的考生数”。

③吴根洲(2007, 2009a, 2009b)关于“985”高校2008年之前的高考录取公平性、生源省份分布以及招生本地偏好问题的研究表明:在2004年,全国有149656名考生进入“985”高校深造,仅占高考总人数的2.05%,且以考生人数少、“985”高校数目多的省份占优;而2005—2007年的“985”高校生源分布情况也表明,“985”高校的省内外招生比例严重失调且有失公允;在2007年,所有的“985”高校的属地招生比例平均值高达36.18%,其中浙江大学属地招生比例更是高达61.61%。

④<http://edu.sina.com.cn/gaokao/>。

⑤在中国的高考划分体系中,除了文科、理科的划分外,还有一类是综合,但是,“综合类”的考生只有极少数地区(例如江苏等),且这类样本缺损严重,只有不到1%的样本,因此,本文并未考虑综合类样本。

⑥例如,2008年北京大学在陕西省的理科招生,在数据中将表现为“北京大学—陕西省—理科—2008”,其他类似。

⑦如果某一高校上一年招生分数较高,引发当年考生群体怕录取分数太高不敢报考的情形,但是,当所有考生均持有此种心态时,又导致报考人数过少,竞争不够激烈,反而可能会使得招生分数下降。等到下一年报考时,考生观察到上一年的低分情形,又竞相报考,导致录取分数偏高。这种高校录取“上一年高,下一年低”的情形,被形象地称为“大小年”现象。

⑧全称为“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其建设的主要任务是“以国家和行业发展急需的重点领域和重大需求为导向,围绕国家科技发展战略和学科前沿,在行业特色型大学的全国顶尖的优势学科重点建设一批优势学科创新平台”。简言之,“985工程”是学校整体入选,“985”平台是优势学科入选。

⑨为了便于直观地分析和对比,此处,本文使用了高校层面的加总数据。因而,样本量和底层大样本数据不同。

参考文献:

[1]白重恩、杜颖娟、陶志刚、全月婷,2004:《地方保护主义及产业地区集中度的决定因素和变动趋势》,《经济研究》第4期。

[2]才国伟、刘剑雄,2014:《收入风险、融资约束与人力资本积累——公共教育投资的作用》,《经济研究》第7期。

[3]曹春方、张婷婷、范子英,2017:《地区偏祖下的市场整合》,《经济研究》第12期。

[4]杜瑞军,2007:《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分配标准透视教育公平问题——对新中国50年普通高校招生政策的历史回顾》,《高等教育研究》第4期。

[5]范子英、李欣,2014:《部长的政治关联效应与财政转移支付分配》,《经济研究》第6期。

[6]范子英、彭飞、刘冲,2016:《政治关联与经济增长——基于卫星灯光数据的研究》,《经济研究》第1期。

[7]郭庆旺、贾俊雪,2009:《公共教育政策、经济增长与人力资本溢价》,《经济研究》第10期。

[8]黄燕萍、刘榆、吴一群、李文溥,2013:《中国地区经济增长差异:基于分级教育的效应》,《经济研究》第4期。

[9]李春玲,2014:《“80后”的教育经历与机会不平等——兼评〈无声的革命〉》,《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

[10]李善同、侯永志、刘云中、陈波,2004:《中国国内地方保护问题的调查与分析》,《经济研究》第11期。

[11]李书娟、徐现祥,2016:《身份认同与经济增长》,《经济学(季刊)》第3期。

[12]刘海峰、李木洲,2012:《教育部直属高校应分布至所有省区》,《高等教育研究》第12期。

[13]刘海峰、李木洲,2014:《高考分省定额制的形成与调整》,《教育研究》第6期。

[14]刘瑞明,2012:《国有企业、隐性补贴与市场分割:理论与经验证据》,《管理世界》第4期。

[15]刘玉铭、张庆华,2006:《中国高考招生的地域歧视、内生经济增长与福利分析》,《经济学(季刊)》第3期。

[16]毛盛勇、刘一颖,2010:《高等教育劳动力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1999—2007年的面板数据分析》,《统计研究》第5期。

[17]钱先航、曹廷求,2017:《钱随官走:地方官员与地区间的资金流动》,《经济研究》第2期。

- [18]曲相霏,2009:《部属高校“地方化”与受教育权平等》,《法学》第11期.
- [19]吴根洲,2007:《“985”高校高考录取公平问题研究——以2004年为例》,《教育与考试》第4期.
- [20]吴根洲,2009a:《“985”高校生源分省分布研究》,《考试研究》第2期.
- [21]吴根洲,2009b:《“985”高校招生属地化问题的实证研究》,《教育学术月刊》第12期.
- [22]邢春冰、李实,2011:《扩招“大跃进”、教育机会与大学毕业生就业》,《经济学(季刊)》第4期.
- [23]杨娟、赖德胜、邱牧远,2015:《如何通过教育缓解收入不平等?》,《经济研究》第9期.
- [24]杨俊、李雪松,2007:《教育不平等、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的实证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2期.
- [25]杨奇明、林坚,2014:《教育扩张是否足以实现教育公平?——兼论20世纪末高等教育改革对教育公平的影响》,《管理世界》第8期.
- [26]余秀兰,2014:《教育还能促进底层的升迁性社会流动吗》,《高等教育研究》第7期.
- [27]岳昌君,2004:《教育对个人收入差异的影响》,《经济学(季刊)》第3期.
- [28]张平、赵国昌、罗知,2012:《中央官员来源与地方经济增长》,《经济学(季刊)》第2期.
- [29]郑毓盛、李崇高,2003:《中国地方分割的效率损失》,《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
- [30]周黎安,2004:《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兼论我国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长期存在的原因》,《经济研究》第6期.
- [31]Bai, C. E., W. Chi, and X. Qian, 2013, "Do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Scores Predict Undergraduate GPAs? A Tale of Two Universities", *China Economic Review*, 30(C), 632—647.
- [32]Barro, R. J., and J. W. Lee, 1996, "International Measures of Schooling Years and Schooling Qual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6(2), 218—223.
- [33]Bishop, J. H., 1987, "Is the Test Score Decline Responsible for the Productivity Growth Declin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9(1), 178—97.
- [34]Bishop, J. H., 1997, "The Effect of National Standards and Curriculum-Based Exams on Achieve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7(2), 260—264.
- [35]Bramwell, A., and D. A. Wolfe, 2008, "Universities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 of Waterloo", *Research Policy*, 37(8), 1175—1187.
- [36]Che, Y., and L. Zhang, 2017, "Human Capital, Technology Adop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 Impacts of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Expansion in the Late 1990s(Human Capital, Technology, Firm Performance)", *Economic Journal*, Vol. 127(4)75—105.
- [37]Ferrara, E. L., A. Chong, and S. Duryea, 2012, "Soap Operas and Fertility: Evidence from Brazil",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4(4), 1—31.
- [38]Golden, M., and B. Min, 2013, "Distributive Politics around the World",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013, 16, 73—99.
- [39]Gregorio, J. D., and J. W. Lee, 2002, "Education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New Evidence from Cross-country Data",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48(3), 395—416.
- [40]Hodler, R., and P. A. Raschky, 2014, "Regional Favoritism",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9(2), 995—1033.
- [41]Liu, S., 2015, "Spillovers from Universities: Evidence from the Land-grant Program",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87, 25—41.
- [42]Shi, Y., R. Liu., and Y. Kang., 2020, "Does a Name Change Attract Better Students? Evidence from Chinese Universities", *China Economic Review*, 60, 101395.
- [43]Young, A., 2000, "The Razor's Edge: Distortions and Incremental Refor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5(4), 1091—1135.